

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探索： 冷战国际史与东南亚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张 云

内容提要 冷战国际史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有着具有竞争关系的相互不同的学术范式,二者对话有其独特的国际史和区域研究背景,展现了一种交叉、融合和开放的学术平台对于学术研究自身的价值。冷战国际史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对话产生“东南亚冷战”这一研究领域,“冷战—学术”的共生性是东南亚知识生产的起点。“东南亚冷战”研究注重冷战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逻辑”,从原本边缘或外围视角审视冷战对世界图景的塑造,在传统“大冷战”研究衰退之际,开辟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新领域。在跨学科意义上,二者结合有利于通过跨学科方法和多视角考察,打通国际史、外交史、冷战史和区域史等研究领域的条块分割,突破传统区域研究的局限,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未来之路。今天,人类既需要在智识上走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冷战桎梏”,也需要建构一种全球性的不问“东西”、多样共存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中国学者有可能在冷战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中探索一条区域国别研究的智识之路,从而真正告别“冷战”。

* 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邮编:510632)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文明进程与区域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4AZD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冷战 冷战国际史 东南亚研究 学术史

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一种独特的非战争状态的意识形态对峙现象。“冷战并非塑造了所有的事情,但它确实塑造了很多。”^①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冷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历史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并在学界产生了“冷战国际史”这样一个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国际冷战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国际学界形成了四大研究中心,并被认为经历了传统冷战研究、新冷战研究和全球冷战研究三个成果丰硕的阶段。^②冷战话语的影响也因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而逐渐扩大,“冷战叙事”在知识史上不仅仅是历史叙事,而且还深深地嵌入到冷战波及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外交、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然而,“冷战”只是一个被发明的词汇,并非科学严谨的政治术语和概括当时大国关系的科学概念。^③冷战这一国际关系现象反映的只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阶段性,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按照其固有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冷战终结为标志的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④在笔者看来,冷战研究需要走出既有“冷战”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窠臼,通过跨学科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多学科平台。本文结合冷战国际史研究“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勃兴,以东南亚研究为例,讨论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进行学科对话与交叉融合的可能,并探讨中国东南亚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动向

在学术研究上,冷战史传统上属于外交史或国际史的研究范畴,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大国关系和外交政策领域,形成了大国中心和外交优先的叙事传

① Odd Arne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24, No.4, 2000.

② 夏亚峰:《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③ 霜木:《冷战起源刍议:兼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④ 余伟民主编:《冷战是这样开始的》,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统,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中,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剑桥大学国际史教授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耶鲁大学教授文安立(Odd A. Westad)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教授沈志华等学者及其相关著述为代表。近几年,冷战研究则进入一种新旧交替的低潮阶段。^①“由于新档案材料的公布减少,国际冷战学术界已经逐渐沉寂。”^②冷战史大家纷纷进行个人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继加迪斯2005年出版的《冷战:一部新历史》之后,文安立2017年出版《冷战:一部世界史》一书,从工业革命催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对20世纪末以来的冷战研究进行全面概括。长岛大学冷战国际史教授夏亚峰认为,这是在冷战研究的重要性或将被弱化之前,文安立试图为冷战研究做出的总结。在中国学界,代表中国学者冷战研究最高水准的《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等著作相继出版。这可能是传统冷战研究的巅峰,预示着上一代学者持守的以文献和档案见长的“大冷战”研究即将终结。传统冷战研究受到挑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新一代学者。随着数字存储技术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数字史学方法和人工智能(AI)技术得到应用,档案解密和数字化处理不再依赖传统手段,依据能够购买、获取或掌握的一手档案来研究历史已不再是少数学者的专利,新一代学者不大可能再沿用上一代学者的治史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现状显然也无法满足国家战略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历史工作者的要求。

冷战研究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如果能够与整体的学术机制对接,从特殊性中抽象出普遍性的规律或价值,成为一个持久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课题并非不可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余伟民勾画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具有跨学科特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反映全球化时代学术走向的一个综合性

^① 尽管文安立等认为冷战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球冷战研究的阶段,但“全球冷战研究”的看法并非学界共识。根据夏亚峰的观察,文安立近几年已逐渐放弃“全球冷战”的提法,《冷战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主编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也曾批评文安立“全球冷战”概念的“发明”混淆了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旧冷战史的说法只是为了推动冷战研究的一种学术说辞,传统冷战研究已经难以把握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历史走势,文安立的新冷战世界史研究也承认了这一点,从而把冷战研究转向了更为宽泛的非政治领域。实际上,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家也无法逃脱冷战史家自我认知和立场的局限性。那么,冷战国际史研究将何去何从,笔者结合自己在东南亚研究和冷战研究中的困惑和矛盾,提供一个可供方家参考、探讨和批评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相融合和共进的学术路径。

^② 夏亚峰:《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94页。

研究领域。^① 近几年来,中国学界自发兴起了一股通过区域国别研究整合不同学科的跨学科创制实践,试图从学术建制和学科发展上推动国际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的整合,这就给冷战国际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交叉和互动的契机。^②

在传统“大冷战”研究衰退之际,冷战国际史研究呈现出两个有别于传统研究的新的趋势:一是冷战研究的“去中心化”,二是冷战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这两种趋势不同于较早之前冷战研究的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等的新旧之争,而是一种未来冷战研究的可能图景。

首先是“去中心化”。加迪斯等老一代学者开拓的冷战研究项目及其相关著述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影响深远。比如,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和《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自出版以来,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引用率。^③ 这种研究状况无形中也设定了冷战研究的叙事框架,“大国中心主义”的叙事成为冷战的主流叙事,非大国的地区和国家在冷战中的角色自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传统冷战史家皓首穷经,造就了卷帙浩繁的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研究成果,后来者沿袭同样的学术路径,已经很难再有突破性成果出现。于是,大国冷战波及的“第三世界”国家自然成为研究对象,中小国家及非政治的相关领域开始受到重视,冷战研究的“去中心化”成为一种趋势,并

① 余伟民主编:《冷战是这样开始的》,第11页。

② 对冷战研究的反思早已有之,早在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全球史教授马休·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在研究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和南北冲突的论著中认为:不能将冷战时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用冷战世界观来分析……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冷战的附庸,我们需要取下“冷战透镜”(The Cold War Lens),原因在于世界不仅需要新的处方,也需要不止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取下冷战透镜,历史学家和后殖民学者将最终意识到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项目,并开始探讨一个“后冷战世界”缘起的问题。参见 Matthew Connelly, “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5, Issue 3, June, 2000。在笔者看来,对冷战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本学科新成果的涌现,而是冷战叙事的路径依赖,即使美国学界新一代冷战学者哈佛大学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裴斗虎(Gregg Brazinsky)把冷战研究重点转向“第三世界”,他们的研究仍然是“大国中心主义”的。因此,由于冷战国际史研究档案资料、叙事框架、学术传承等的特殊性,后来的研究者很难摆脱这种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弗里德曼和裴斗虎的研究参见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Gregg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③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1987;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取得一定成就。“冷战研究‘去中心化’就是将冷战时期的中小国家放在显著的位置,从冷战时期发生在中小国家的事件中寻找他们与冷战的直接联结,而不只是关注他们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互动……这样做需要将冷战冲突与发展与冷战之前的一系列问题如非殖民化、民族国家的形成、阿以冲突、欧洲一体化等命题一起作综合考察,从而修正欧洲中心论的冷战史标准叙述。”^①

其次是跨学科。年轻一代学者已经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如宗教与冷战、文化与冷战、科技与冷战、学术与冷战甚至环境与冷战的研究。由于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学科背景,所有与此相关研究仍被归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然而,此类研究已经不是传统的以冷战为主题的外交史或国际史研究,而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至于跨越学科边界到什么程度,则要依据不同学科的标准来参照。鉴于“真正优秀及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必定会在不同的意义和层次上表现出跨学科的特点……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不能因学科设置方面的因素而出现‘人为切割’的局面”。^②不过,就国内学界而言,目前冷战国际史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对话并不充分。鉴于不同学科专业壁垒的限制,冷战国际史研究者也大多从自己的学科范畴出发来进行研究。由于学科属性不同,冷战国际史研究对其他学科可能的“入侵”更多是一种本能的反抗和批判,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学科互动。实际上,这种由冷战主题衍生出来的跨学科研究,可能预示着冷战国际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东南亚冷战研究的学术史

东南亚冷战研究是冷战国际史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交叉领域,对于考察世界历史进程中区域性的“解构”与“重构”现象,以及从区域视角认识冷战的历史本质有重要学术意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要概念是“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而不是冷战。这种现象在20世纪末得到改观,冷战期间多边档案逐步解密,区域史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东南亚冷战”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之一。不过,根据笔者观察,“东南亚冷战”并非专门研究东南亚的

^① 夏亚峰:《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84页。

^②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1页。

“冷战”现象,而是研究东南亚与国际冷战的关联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学术命题。

在冷战研究中,东南亚属于第三世界或中间地带,是冷战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不过,在“大国中心”的冷战史观中,东南亚在冷战研究兴起之时,并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美国学界早先关于东南亚冷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越战和冷战的相关著述,主要成果有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米切尔·亨特(Michael H. Hunt)的《林登·约翰逊的战争:美国冷战中的对越圣战(1945—1968)》、阿肯色大学历史学教授兰德尔·伍兹(Randall Woods)的《富布赖特、越南与冷战外交的寻求》和波士顿学院历史学教授塞斯·雅各布斯(Seth Jacobs)的《冷战政要:吴庭艳与美国越战的根源(1950—1963)》。^① 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被认为是研究冷战与东南亚问题的权威学者,主要论著有《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尼独立的斗争(1945—1949)》《帝国的局限:二战后的美国与东南亚》等。^② 东南亚作为殖民地的历史使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学者在该领域有独特的优势,其中以奥克兰大学东南亚史教授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和澳洲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教授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 Milner)影响较大,他们都是英国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前者著有《不列颠、东南亚与冷战》《不列颠、东南亚与朝鲜战争的影响》和《东南亚“区域主义”:扶植政治意愿》等,后者论著有《区域、安全与历史的回归》和《本土化、区域主义和东南亚的观念史》。^③ 上述相关著作多是西方学者对欧美外交史或大国冷战史的解读与反思,在他们的笔下,东南亚区域和国家只是冷战国际史的配角,被动纳入冷战国际史叙事之中。具有东方学研究传统的欧洲学界在研究东南亚冷战时,则表现出与上述学者不同

^① Michael H. Hunt,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1945-1968*, Macmillan, 1997; Randall Woods, *J. William Fulbright, Vietnam, and the Search for 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 Ngo Dinh Diem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ar in Vietnam, 1950-1963*,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② Robert J. McMahon, *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49*,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J. McMahon and Robert McMahon,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NUS Press, 2005; Nicholas Tarling,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to Foster the Political Will*, Routledge, 2006; Anthony Milner, *Region, Security and the Return of History*, No.1,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Anthony Milner, "Localization, Region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41, No.3, 2010, pp. 541-549.

的学术路径,主要体现在后殖民主义研究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反思。例如,英国赫尔大学东南亚研究高级讲师和研究员克莱夫·克里斯汀(Clive J. Christie)是东南亚“去殖民地化”与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学者,相关论著有《东南亚现代史:去殖民化、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东南亚的意识形态与革命:反殖民时代的政治观念:1900—1980》和《越战、冷战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等。^①

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冷战的研究经过了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交替之际,面对冷战结束这一重大事件,世界近现代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自发地把冷战纳入到各自研究议题中。有学者关注到中美苏在越南的争夺,也注意到冷战后期美苏日等的东南亚政策及东南亚“区域主义”兴起等相关议题。^②但此时的东南亚冷战研究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只是中外关系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延伸,还未与国际学界的冷战研究真正对接。进入21世纪后,国际冷战研究进入新阶段,即学界所说的“新冷战研究”,诸多原始档案解密或公开,冷战研究在档案整理与研究方法上获得重要突破,这也直接深化和拓宽了国内的冷战研究。^③在陈兼、张曙光、沈志华等学者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下,中国学界的冷战研究开始与国际学界主流的冷战研究对接,东南亚作为冷战争争的重要区域受到重视。2010年以来,在方法论上,有学者注意到冷战国际性和本土性的“双重逻辑”,冷战的亚欧互动和东南亚冷战作为新的研究课题受到关注,东南亚国家冷战期间的原始档案得到重视,“东南亚冷战”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④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印尼外交、越南战争、老挝危

^① Clive J. Christie, *A Moder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Decolonization,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B Tauris, 1997; Clive J. Christie and Clive J. Christie, *Ideology and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00-1980*, Routledge, 2012; Clive J. Christie, *The Vietnam War, the Cold War and the Crisis of Western Liberalism*, You Caxton Publications, 2016.

^② 王士录:《从军事政治对抗走向经济合作:论8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10期;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潘黎明:《试论东盟全面进展的15年(1977—1992)》,《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尤洪波:《冷战期间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演变》,《东南亚》2000年第3、4期;尤洪波:《冷战期间苏联对东南亚的政策》,《东南亚》2001年第3期;刘莲芬:《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韦红:《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主义的特征》,《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陈奉林:《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探索》,《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③ 张小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

^④ 余伟民:《国际性与本土性:冷战的双重逻辑——读〈冷战与革命〉》,《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1期;沈志华:《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向》,《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崔丕:《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机、华侨华人研究等从冷战视角开始被重新认识。^①

海外华人学者是另一个研究东南亚冷战的重要群体,他们大多在欧美冷战研究重镇受过学术训练,表现出与国内学界和欧美学界不同的视角,代表学者有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教授刘宏、洪清源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教授刘孔华、周陶沫等。他们着重关注冷战背景下那些被宏大的冷战叙事掩盖或忽略的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以及非殖民地化、民族国家建构和少数族群特别是华人移民的生存处境。刘宏的《中国与印尼的塑造:1949—1965》一书考察了一种有别于大国冷战框架与民族国家叙事的印尼建国之路,是一部中国与印尼在知识、权力、族群与外交等方面全方位互动的双边关系史。^②刘孔华主编的《东南亚与冷战》一书为冷战意识形态下的东南亚海岛与陆上国家各自描述了一个“下弧”和“上弧”的不同演进路径,洪清源的《东南亚冷战史》则通过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和新近的学术发现来阐释一个连贯和完整的东南亚冷战史。^③周陶沫的《革命时代的移民:中国、印尼与冷战》一书通过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口述历史访谈,深入研究了冷战初期海外华人在中国与印尼之间的身份困境,展示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国家建构体系之外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观念的困惑。^④

最近十年来,随着资讯发达和青年学者的成长,国内外学界的“东南亚冷战”研究在选题和方法上逐渐合流和趋同。其中,选题的社会化和方法上的跨学科倾向是其重要特征,文化冷战成为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论上逐渐开始超越冷战范式。相关代表性著作有: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历史系教授克里斯托夫·高夏(Christopher E. Goscha)和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主任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Christian F. Ostermann)主编《连接历史:东南亚的“去殖化”与冷战(1945—1962)》、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爱德华·凯瑟琳(Edwards Kathryn)的《争夺印支:去殖民地化与冷战之间的法兰西印记》、达

^① 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刘雄:《老挝危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高艳杰:《艾森豪威尔政府秘密支持“外岛叛乱”的缘起》,《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吴浩:《越战时期美国与盟国的信任危机:以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为例》,《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孙丽萍:《国际组织与东南亚经济冷战:国际援助印尼财团IGG缘起探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② Liu Hong,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Singapore: NU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Albert Lau, e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ld War*, Routledge, 2012; Ang Cheng Guan, *Southeast Asia's Cold War: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④ Zhou Taomo,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特茅斯学院地理和环境学教授克里斯托夫·斯内登(Christopher Sneddon)的《混凝土革命:大坝、冷战地缘政治学和美国垦荒局(1950—1970)》、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尤金·福特(Eugene Ford)的《佛系冷战:佛教与美国在东南亚的秘密战略》等。^①中国年轻一代学者也有类似相关成果问世。^②由此,冷战叙事不再只是一种大国间政治的呈现,后殖民主义、区域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叙事开始解构大国主导的冷战范式,“发展模式、依附结构、前所未有的社会军事化和帝国启蒙的设想,甚至许多性别和种族—文化关系都在两个阵营之内或之间遵循着类似的轨迹。”^③如前所述的英国学者克莱夫·克里斯汀的研究已经超越“冷战”。克里斯汀的《越战、冷战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在冷战背景下对越战进行再阐释:一方面,美国通过越战遏制了东南亚共产主义力量,导致东南亚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冲突并走向瓦解,同时允许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在东南亚发展,这种状况使东南亚冷战的结束比欧洲至少提早十年;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削弱了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优越感,也预示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这种判断已经超越了冷战范式,对于理解今天国际政治的变局有重要启发。^④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上述国内外研究分别从国际史、外交史、区域史和移民史等不同视角涉入冷战与东南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成果的学术视角、研究方法及学术贡献都为“冷战与东南亚”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坚实基础,形成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与区域研究在东南亚的跨学科、多领域学术对话,推动了

^①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Stan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9; Kathryn Edwards, *Contesting Indochina: French Remembrance Between Decolonization and Cold War*, Vol.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Christopher Sneddon, *Concrete Revolution: Large Dams, Cold War Geopolitics, and the US Bureau of Recla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Eugene Ford, *Cold War Monks: Buddhism and America's Secre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参见翟韬:《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宣传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张杨:《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③ Prasenjit Duara, “The Cold War as a Historical Period: An Interpretive Essa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6, No.3, 2011.

^④ Clive J Christie, *The Vietnam War, the Cold War and the Crisis of Western Liberalism*, YouCaxton Publications, 2016.

相关研究议题的开放性和延展性。近十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对话,既体现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共生性特征,也呈现出两个研究领域交叉与融合的未来趋势。

(一)“冷战—学术”共生性是东南亚知识生产的起点

东南亚研究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汇流是美国智库与学术界共同推动的结果。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关于“未来之争”的分歧,美国政府摒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孤立主义”政策,调动学术界支持美国对外战略,美国的区域研究由此开始扩张,全球不同的区域板块都得到充分重视,东南亚是美国冷战版图上最重要的拼图之一。在此意义上,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兴起,与冷战战略寻求学术支持是分不开的。西方学界的东南亚研究最初是殖民事业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发展成为一项带着冷战使命的学术事业,受到福特、洛克菲勒等非营利组织和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资助。不过,早期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并不是专门服务于冷战需要的,他们大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学术上倾向独立于政府之外。当然,也有一开始就得到军方或情报部门支持的研究项目,大多依靠殖民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建立的人脉关系到东南亚进行田野调查,一个典型例子是已故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正式任职研究院之前,曾在缅甸和其他地方的学术田野中充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线人。^①因此,区域研究推进与冷战加剧有重要关联。^②

从学术传承上来看,中国学界的东南亚研究是清末南洋“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的延续,“冷战”加速了中国学界对世界认知的转变,就区域观而言,从“南洋”向“东南亚”的转换是比较典型的。“南洋”是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本土知识谱系中最重要的对外想象,“中国本土化”南洋观和反殖话语的构建,使

^① 詹姆斯·斯科特的专著《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等被视为东南亚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关于美国人类学家和美国中情局的关系,参见 Robert Oppenheim, *Cold War Anthropology: The CIA, the Pentagon, and the Growth of Dual Use Anthrop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早在1956年,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学者白鲁恂就通过访谈马共成员撰写了《马来亚共产党游击战争》一书,通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马共的政治行为,成为美国了解东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差别最重要的一线信息,参见 Lucian W. Pye, *Gue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另一个例子是华人学者王赓武在1960年得到美国亚洲基金会的邀请和支持,访问美国14所大学的亚洲研究机构。从王赓武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美国亚洲基金会承担着“文化冷战”的使命,区域研究正是美国对外文化冷战重要的一部分,详见王赓武、林娉婷:《心安即是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217页。

“南洋”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最重要的参照之一，在东南亚研究中烙下深深的“中国中心主义”叙事印记。^①然而，冷战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生态，正是“冷战”在政治和学术话语上区隔了传统史地学和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推动传统南洋史地学向现代东南亚研究的转型，并最终与国际学界接轨。^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东南亚”成为美国知识界广泛使用的概念，也影响到中国知识界。即使在东南亚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东南亚研究也被认为是美国学术“再殖民”的产物，受到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把“东南亚”视为印度和中国以外的一个独立的地区，如乔治·卡欣(George Kahin)于20世纪5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开创的“东南亚项目”项目即是终其一生的学术事业，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接替殖民时代的欧洲学者，逐渐掌握了国际学界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东南亚自身的东南亚研究几乎也都成为“他者”的事业。“在由冷战启动的现代化进程的驱动之下，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建构总体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并被西方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主导。”^③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东南亚的冷战研究成为一块被欧美学者“再殖民”的学术领地，甚至有来自东南亚的学者认为，今天的东南亚研究与殖民帝国时代相距并不远，东南亚学界的东南亚研究并不存在。^④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教授吴明兰(Goh Beng-lan)认为：“如果说冷战明确了一件事，那就是该地区学术话语中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往往与民族—宗教政治密不可分，而且从未单独以世俗主义的方式进行斗争。然而，该地区复杂的左翼意识形态想象往往被束缚在美式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冷战意识形态的类型学中，这种

① 参见陈颖：《现代中国知识谱系中的南洋(1911—1937)》，南洋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陈岭：《“反殖”与“殖民”：中国本土化南洋观和“殖民”话语建构——暨南大学的南洋书写(1927—1937)》，《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东南亚研究本身也受到冷战影响，成为学术冷战的战场之一。建国后，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也经历了冷战年代的多次沉浮。其中，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是个典型例子，经历了“两落两起”。该所的前身是1927年暨南大学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1951年暨南大学停办时，该所也停办，1961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后，该所复办，1966年暨南大学再遭停办，该所也同时停办，1978年，东南亚研究所随暨南大学复办而复办。

③ Amri B. Shamsul, “Producing Knowledge of Southeast Asia: a Malaysian View,”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2015, p. 136.

④ Ariel Heryanto, “Can There Be Southeast Asian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ussons. Recherche en sciences humaines sur l’Asie du Sud-Est* 5, 2002, pp. 3-30; Wong Tian An, “Shoul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xist? Field Notes from an Interloper,” April 18, 2022, <https://doi.org/10.52698/FFXT6632>.

类型在该地区越来越流行。”^①因此,“冷战—学术”的共生性是东南亚知识生产的起点,所有东南亚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都无法忽略这个原点,因为这就是东南亚区域和国家事业(包括学术研究)开始的地方。

(二) 冷战史研究方法深化和拓宽了东南亚研究

冷战距今并不遥远,今天东南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冷战研究找到答案。例如,东南亚不同国家政权的形成、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东盟的兴起等,都是冷战的产物。对欧美国家来说,正是冷战无意中促成了区域主义事业,并允许东南亚区域主义进入自己的阵营。^②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的原因,东南亚的本土文明进程常常容易因外力影响而导致断裂,东南亚的近现代史也是复杂、多元和碎片化的,诸多问题都是个案或者零星的存在。不放在冷战研究方法的透镜之下,东南亚很难自成一个体系,也正是冷战塑造了东南亚这样一项系统性的区域事业。

东南亚史的研究存在不同学术路径,既有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也有“区域主义”的整体演进,还有“后殖民主义”的全球叙事,在本体论上还存在着“陆派”与“海派”的争论。^③在方法上,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甚至语言学等不同学科方法都会在东南亚研究中使用,形成了东南亚研究方法的多元路径。然而,由于学科壁垒所限,当前的东南亚研究更多是一种工具性的知识生产,单一学科的功能主义方法很难产生与政治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水平相当的学术成果,也很难驾驭冷战时期多线条、多层次历史事件的复合交叉。例如,印尼的20世纪60年代对东南亚的区域政治演进有重大影响,正是印尼外交政策的转变促成东南亚次区域开始走向“安全化”^④,若不借助冷战研究的史学方法,历史真相很难呈现出来。根据印尼科学院政治研究中心教授德维·安瓦尔(Devi F. Anwar)和周陶沫的研究,印尼的转变正是民族主义、中立主义、亚非主义、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交叉、竞争和选择的结果,只有

^① Goh Beng-lan, ed., *Decentring and Diversify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Regio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p. 28.

^② Albert Lau, e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ld War*, Routledge, 2012, p. 10.

^③ 关于李伯曼与安东尼·瑞德的争论,参见张云:《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

^④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130页。

通过冷战研究这种剥茧抽丝的方式,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①正如王赓武所说:“我们仍需要了解冷战是如何实际改变局面,并将民族主义或国家建构的努力引导到一个之前无法预料的、也不适用于任何其他地方特定经验模式的方向”。^②因此,东南亚研究需要通过冷战史研究方法进行拓宽和深化,冷战期间多边档案的解密和冷战研究方法的更新给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东南亚研究中,熟稔冷战国际史对区域研究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例如,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韩恩泽在《强邻在侧:中泰国边区博弈下缅甸的国家命运》一书中,充分利用相关史料,对边区军事化、边区共产革命的冷战背景进行分析,提出一种“邻域效应”的理论,对缅甸今天的发展现状提出有力解释。如果只是关注于缅甸自身的国族建构,忽略这种大国冷战的结构性矛盾,就难以理解今日缅甸现代国家建构的艰难历程。^③

与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研究视角不同的是,冷战史研究方法解析下的“东南亚”对今天有可以感知到的直接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以史为鉴的功能。例如,洪清源的冷战研究专著《东南亚协约组织》通过20世纪50—80年代的解密档案来重新认识东南亚协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并对其进行客观和审慎的评估。^④该书探讨冷战背景下多边联盟是如何形成、如何运作以及随后是如何解散的,对于认识今天美国主导的亚洲版北约计划——“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实际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 聚焦东南亚的冷战研究有助于走出“冷战”叙事

“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分析领域的话语中,‘冷战思维’这个概念通常是指美国或苏联有关冷战以及相关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套概念和逻辑。”^⑤冷战话语在国际学界的现状表明,虽然冷战已经结束30多年,但“冷战思维”

① 关于印尼20世纪60年代内政外交冷战视角的研究,参见 Albert Lau, e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ld War*, Routledge, 2012, pp. 133-150; Zhou Taomo,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32-151.

② Wang Gungwu, ed., *Nation 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p. 269.

③ Han Enze, *Asymmetrical Neighbors: Borderland State Building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7-72.

④ Ang Cheng Guan, *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Routledge, 2021.

⑤ 牛军:《“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含义》,《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依然挥之不去,甚至冷战研究者自身都难以摆脱大国中心的学术路径依赖,在自我强化的“冷战话语”里而很难自明。传统冷战研究的本体叙事大多是大国叙事,中小国家和地区的角色在研究中多被边缘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个体的、边缘的、区域的历史在世界历史进程特别是冷战年代的反向作用。“正如亚洲基金会所察觉的,美国也丝毫不了解那些因为欧洲帝国主义而肇建的东南亚新兴小国,都必须自谋生路以免再受人控制。”^①就东南亚而言,大国冷战并没有主导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反而是东南亚频发的历史事件对大国冷战走向起了关键作用,逆向影响了大国关系的走向,如“九二零事件”、新加坡建国、柬越战争、东盟北扩等。

在一个日渐“去中心化”的全球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的重心逐渐向区域层次转移,冷战是切入东南亚研究的重要视角,同时,东南亚研究也在反向挑战和对冲冷战研究设定的大国框架和研究路径。如前所述聚焦东南亚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一方面,从冷战发生学的意义上展现冷战是如何对外围地区和国家进行再造的,丰富世界冷战史的区域国别图景;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大多已走出大国冷战叙事的既有框架,展示了与冷战休戚相关的具体的、鲜活的国际史、外交史内容。实际上,“冷战并没有禁锢住历史的发展,相反,今天世界的许多事物(在经济、政治、社会、艺术等各方面)都是在冷战时期萌芽和发展起来的。”^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其他地方比东南亚更“热”,但东南亚却从美国支持的“冷战之弧”(the peculiar arc of the cold war)中受益。^③受本土化政治影响,“去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在与冷战叙事的竞争中通常会胜出,并成为东南亚研究中的主流叙事。冷战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历史借鉴,最终“走出冷战”,东南亚提供了这样的历史经验。聚焦东南亚的冷战研究是去大国、去中心化的,有利于解构“冷战”叙事,并最终告别“冷战”。随着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不少掌握马来语、泰语、缅语等对象国语言的学者也加入冷战研究队伍,这将大大丰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本土化内容,在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中深度解构“冷战”话语,让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最终回归客观世界本身。

近些年,东盟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

① 王赓武、林娉婷:《心安即是家》,第199页。

② 张云:《庄礼伟“人之共同体”建构及其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Benedict Anderson, From Miracle to Crash,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20, No.8, April. 16, 1998.

盟的兴起是冷战格局下发生在东南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既避免东南亚滑向“后殖民冲突形态”的危险,也对今天的亚太乃至全球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冷战期间中美日三方原始档案和文献的对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崔丕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东南亚冷战进程中,东西方对抗与地缘政治对抗同时并存,东南亚冷战的结构实际上是“冷战”“革命”“非殖民地化”和“经济开发”的多元构造。1967年东盟的成立是东南亚冷战体制向东南亚开发体制的转换,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对东南亚冷战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在于它开启了东南亚冷战体制向东南亚开发体制转换的历史进程。^①这种聚焦印尼债权国会议的研究能够将印尼“九三零事件”、东盟成立、中苏论战等冷战不同圈层的事件相互串联起来,形成一种内在的冷战因果链条和阐释逻辑,从而解构大国“冷战”叙事,为告别“冷战”提供了典型的东南亚区域案例。再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姚昱和郭又新对冷战年代中马橡胶贸易的相关研究,展示了复杂的、多边的国际冷战政治对中马双边核心利益的影响,凸现了中马经贸关系在全球产业链和长时段维度里的地位,此种研究实际上已经在解构冷战叙事,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走出冷战国际史研究设定的框架。^②

从总体上看,冷战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结合有利于通过跨学科方法和多视角考察,打通国际史、外交史、冷战史和区域史等研究领域的条块分割,突破传统区域研究的局限,探索冷战视阈下的区域研究路径。当然,冷战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对话需要继续深入。譬如:从地理位置来看,海洋东南亚(Maritime Southeast Asia)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原因何在?这样的探讨实际上触及冷战实质,即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不一样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过来又成为一种塑造政治地理版图的观念性力量,这种观念又与当地不同人群的思想、文化和习惯有千丝万缕的“在地化”联系。产生两种意识形态的大陆与海洋背景,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治理方式和思想观念息息相关。这不只是冷战的地缘政治学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还是不同地理条件下的国家或族群如何共处的问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和研究。当然,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在目前的学科体制下都有各自的学科边界,“‘冷战地区研究’忽视和贬低了驱动地区研究的深刻文化关切以及丰富的学术和智

① 崔丕:《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397页。

② Yao Yu and Guo Yongxin, “The Sino-Malaysian Rubber Trade, 1950-80: A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19, Issue 1, 2024, pp. 1-20.

识内涵……地区研究中有与‘冷战史’交叠的部分,但地区研究整体不能被置入冷战史之下。”^①不同学科分类导致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和融合被人为割裂。

四、中国学界关于冷战与东南亚研究的反思与重构

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交叉与融合中,中国学界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由于起步较晚,与国际学界特别是欧美学界的研究尚有差距。虽然国际学界“东南亚冷战”研究主流的学术话语目前仍在英语世界,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拥有独特的地理、社群和人文优势,可以有所作为。笔者认为,国内学界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反思和重构:

(一) 从中国视角对东南亚国际共运的得失成败进行总结

源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度席卷东南亚,东南亚冷战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殖民地时代的落后和闭塞,东南亚的人们基本是在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的情况下,遇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的新思想。东南亚国家建构的过程伴随着外部大国间的冷战和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同族群的人多是被动的卷入几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冷战期间,东南亚不同板块的传统与现代、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各种内外力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重新集聚,新型政党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大多师从原殖民宗主国的“民族国家”原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东南亚的再造与影响延续至今。对中国来说,历经“九二零事件”、柬越战争和中越边境冲突等大半个世纪的各种党际冲突,中共逐步放弃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随着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新中国与东南亚主要国家纷纷建交,“民族国家”原则取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国家间关系取代了党际关系和“革命友谊”。由于苏联在冷战中的错误与教训,在国际学界的冷战研究中,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常常成为批判对象,一方面,欧美学者通过美英法等国的解密档案、口述访谈和相关文献,掌握了东南亚冷战叙事的话语权;^②另一方面,来自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研究并不多,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主

^① 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与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 年第 1 期,第 54—55 页。

^② 刘莲芬、施屹立:《国外关于 20 世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6 期。

角——东南亚共产党^①，通常成为辩解的一方，如原马共总书记陈平在《我方的历史》的辩白。^②因此，东南亚的冷战叙事通常是我者行为的“他者”叙事，其中，难免有失公允，带着对东南亚共运的偏见甚至歪曲。实际上，冷战研究的学术话语源于资料、档案和文献的占有，若不想任由外围学者对东南亚冷战进行“他者”阐释，只有依据学术伦理逐步开放内部档案，通过文献整理、口述访谈和史料挖掘，对东南亚共运史的得失成败进行“我者”的深刻反思。如若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不回避，就能达成与东南亚学界乃至国际学界的最大共识。因此，对冷战视阈下东南亚研究，中国学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二）坚持一手史料的挖掘，特别是原始档案和口述史料的使用

首先是档案问题。冷战期间的档案，无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官方限制严格，解密和公开的都比较少，民间零散的多，但却难于收集，常常要靠人脉和运气才能获得。虽然国内冷战研究已开始重视搜集原始档案，并有到东南亚搜集档案的经验及相关成果。^③但就目前而言，原始档案及相关文献的获取、挖掘和整理并不是东南亚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同档案、文献、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之间的互相印证和比较研究欠缺，对欧美解密档案的使用也不够。更重要的是，国内学者对原始档案的职业敏感性远远不够，例如，中国外交部曾于2004—2008年开放大量档案，但当时却鲜有学者重视，当档案管理再次收紧，这批档案已经很难再看到，对于从事冷战与东南亚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是一大学术憾事。^④当然，学术界也有责任根据学术伦理推动有关部门有条件的开放相关档案。早在2003年，陈兼就提出：“如何实现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并使得学者们有可能在更广泛利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达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应当受到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⑤其次，是口述史料问题。美国学界早就开始重视口述史学在冷战研究中的使用，如达特

^① 东南亚共产党是指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总称，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其中，南洋共产党是1927—1930年活动于英属马来亚和海峡殖民地的共产主义政党，前身为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后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以马来半岛为主要活动据点的南洋共产党于1930年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

^②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③ 梁志等：《冷战史研究东南亚国家档案导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吴尔蓓密：《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介绍：东南亚诸国（1949—1965）》，《当代中国研究期刊》2015年第2期。

^⑤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茅斯学院政治学教授威廉·沃尔夫(William C. Wohlforth)主编的《冷战终结:口述史、分析与探讨》一书对口述史料的使用。^①再如,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SEAP)发起的越南口述史项目,访谈对象为原南越驻美大使裴琰(Bùi Diễm),该访谈提供了不亚于任何档案和文献记录的第一手的口述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冷战年代越南内外各种力量的互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②“冷战导致地区大环境在(各国)独立后发生了如此迅速和出乎意料的变化,以至于建国的领导者都没能真正执行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可能离冷战太近了,无法回头看看冷战在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构到底是如何开启、塑造和进行的。”^③今天,当年的当事人很多仍然健在,完全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形式来追溯这段历史。东南亚冷战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具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档案和文献能够获得的极为有限,不过,该领域的口述史资源却非常丰富,诸如裴琰这样的当事人就是越战研究的活化石。实际上,史料使用的关键不是原始史料(包括档案、文献与视听资料等)的记录形式,而是史料真伪的辨识,口述历史真实性的关键是受访者所述“历史内容”真实与否。进入21世纪,口述史学的方法在我国学界也已得到认可和广泛使用,^④在东南亚研究中,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也得到了验证,如:周陶沫的《革命时代的移民:中国、印尼与冷战》一书中对印尼归侨、北大学者梁英明的口述访谈记录的使用,既与其他史料可以相互印证,也展现了口述史料的历史穿透力。^⑤今天,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里,对已经高龄的当事人进行口述史料访谈,实际上是在抢救历史,对东南亚冷战史研究来说,这个显得尤为紧迫。

① William C. Wohlforth, ed., *Cold War Endgame: Oral History, Analysis, Debates*, Penn State Press, 2010.

② 口述访谈对象裴琰(Bùi Diễm)1967—1972年为南越驻美大使,该访谈先后历时八年(2012—2019年),后制成了《人与历史:外交官眼中的美国越南干预,1965—1975》的历史纪录片,片子时长达17小时,参见<https://indomemoires.hypotheses.org/28478>,2020-04-30。

③ Wang Gungwu, ed., *Nation 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p. 269.

④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及现状,参见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关于周陶沫对梁英明口述访谈资料的使用,参见Zhou Taomo,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3。有意思的是,笔者在另一位台湾归侨林保华的回忆录里发现了同样的关于梁英明的记录,这种史料的相互印证,穿越时空,把北京、台北与梭罗联系在一起,还原了1955年的历史场景,参见林保华:《我的杂种人生:林保华回忆录》,台北:前卫出版社2019年版。

(三) 对东南亚华人重新审视,对其本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深入研究

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庄国土的研究,“东南亚有 3348.6 万人,约占全球 4543 万华侨华人的 73.5%”。^① 这么一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国内学界对其认知长期以来却存在诸多错谬之处,甚至以讹传讹,冷战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诸多悲剧也多与此有关。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内学界长期存在一种类似“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中心主义”认识论,并衍生出血统主义、意识形态和功利主义三种文化、政治与经济上的倾向。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知识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认识通常存在根深蒂固的血统主义,这种认识在冷战年代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20 世纪末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中,经济导向的“华人资本主义”一度成为主流。^②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师从苏联的“民族划分”及相关政策在半个多世纪的国家治理中创造出一种融合欧洲“民族国家”原则和中国多元族群传统的“领土民族性”(territorial nationality),最终使今天的国内人群呈现出与周边华人乃至港台国人诸多不一样的特性。在东南亚,除了新加坡,华人在现居国通常被认为是“华族”或少数族裔,这就使“华人”(Chinese)这样一个代称既有“nation”的意思,又有“ethnic”的含义,甚至隐隐地还有“race”的意味,这就给更高一阶的文明认同带来了困惑。^③ 这种困惑又因不同学科、不同国籍学者研究取向的不同带来更大差异,导致国内与国际的东南亚知识社群缺乏基本的学术共识。“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主题和争论似乎与中国外交史学者的主要关切相去甚远。虽然早期的研究认为华人对祖籍国有着先天的爱国情怀……但海外研究更强调他们身份的混合性和多元性。”^④ 华人拓殖东南亚的历史远早于欧洲殖民史,东南亚的“华人性”(Chineseness)特征远超其他地区,是地理、环境、人文等关键因素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不同宇宙伦理(cosmology)的族群在同一区域共融共存的结果,这种现象实际上非目前比较流行的学术范式所能解释(例如,源自西方的“殖民”“冷战”和“民族—国家”解释范式)。因此,要搞清东南亚华人的实际状况及其与中国的真实关系,就需要对冷战视阈

① 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第14页。

② Yos Santasombat, ed., *The Sociology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Springer, 2018.

③ 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第65页。

④ Zhou Taomo,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pp. 11-12.

下的华人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变迁进行长时段的深入研究。方法上,需要通过跨学科方法和科学的研究议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研究。在本体论述上,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呈现东南亚华人本土的、跨国的、区域的乃至全球的多样的历史叙事。例如,根据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石之瑜的研究,东南亚的华人更强调差异性,而不是华人身份的正统性(即“华人性”,Chineseness),由此,可以发展出一种后华性(post-Chineseness)的学术议程,这种路径对冷战视阈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有重要启示。^①

结 语

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有着具有竞争关系的相互不同的学术范式,但二者是可以交叉、融合并生产新的知识。一方面,国际冷战是东南亚国家建构的时代背景,在东南亚研究中挖掘这种国际背景与本土政治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揭示冷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生学规律;另一方面,东南亚研究属于区域国别研究,具备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特征,是冷战国际史“去大国”和“去中心”研究的天然试验田,冷战研究方法可以在这里尝试,冷战研究的假设可以在这里得到验证,冷战研究的史料在这里也可以深度挖掘。当然,二者都有各自的学科局限,需要在交叉融合中加以避免。首先,要把国际冷战史研究作为一种智识有限的学术事业,避免“泛冷战化”的学术议程,保持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开放性。冷战思维是东方与西方、帝国与殖民、建构与解构……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改造世界时的观念投射,反映了人类对世界认知的单向度的局限。冷战意识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也是人文社科研究自身的特征之一。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要避免无限放大冷战史的现实影响。其次,不能简单地把区域研究都归于冷战背景下的学术创制。从学术意义上看,“冷战”意识是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认知的一种,在知识类型学上看,它是同步发生的,以东南亚为例,“后殖民主义和跨国主义,种族和宗教、关于

^① 石之瑜从知识史研究,发展出“后华性”的分析议程,探讨汉学性、华人性、中华性和中国性所共同构成的认知网络,通过搜集关于中国的概念、想像与策略,对个别行为者之间,如何重启文化资源,恢复或建立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关于石之瑜的相关研究,参见 Shih Chih-yu, ed., *Re-producing Chineseness in South-east Asia: Scholarship and Ident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17; 石之瑜:《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与“后华性”实践》,《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

法律和司法的各种想法,以及媒体的角色,各种特有成分都突然被推开。”^①再次,不能简单地混淆冷战争论与东南亚研究的关系。“地区研究创生史在本质上是一个学术性事态,过于简单化的‘冷战知识史’或者‘冷战社会科学史’对政治—学术关系的认识模式不符合这一实际历史过程。”^②把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和学科计划都作为冷战内容来研究,甚至把冷战研究者及相关项目也置于一种冷战角色之中,是一种可能伤及冷战国际史研究事业的潜在危险,也是需要学界提防和谨慎处理的。

沃勒斯坦认为:“只有当体系本身面临危机时,我们在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上才有了真正的选择”,^③学术研究才有了突破的机会。文安立也认为:“国际史学者到目前为止所表现出的对旧的解释提供新证据的非凡能力将不再是主流,而且在未来,我们将看到一个在冷战结束前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更多样化的方法和阐释领域。”^④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既需要在智识上走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冷战桎梏”,也需要建构一种全球性的不问“东西”、多样共存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这意味着冷战国际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话有了更进一步可能。中国与东南亚有绵亘千年的历史交融和一衣带水的地理关联,这就使中国学界的东南亚研究与殖民时代欧洲的“东方学”,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区域研究”明显不同,东南亚研究正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理论建构和学术实践提供新的可能。

① 王赓武:《心安是家》,第54页。

② 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1页。

④ Odd Arne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24, No.4, 2000, p. 565.